

迷失在陌生的国度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天堂.....	1
第二部 流亡.....	48
第三部 新世界.....	83

第一部 天堂

1959年4月的一天，我站在‘芭特蕊’号轮船上层甲板的栏杆边，感觉生命将到尽头。船快要从格得尼亚港起航了，我望着那些聚集在岸边送别的人群，突然间，觉得他们不可挽回地留在了另一边，我想逃离，逃回去，回到那熟悉的激动、挥舞的手臂、与那一片呼喊中去。我不能就这样将一切抛在身后——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那时我十三岁，我们要移居国外了。这概念有着一种压倒一切、已成定局的意味，以至对我，似乎也意味着世界末日。

妹妹小我四岁，她无言地紧抓着我的手，几乎不明白我们在哪儿，或我们的生活中正发生些什么事。我父母极度不安；他们刚刚被海关警察搜了身——这也许是反犹太人的骚扰行为的一个告别动作。但这些官员们还不够足智多疑，没想到来检查我和我妹妹——真幸运，因为我俩都携带了一些不让带出波兰的银器，这些银器缝在我们裙子里那些专为此目的设计的大口袋中，外面再罩上宽大的毛衣。

当岸边的铜管乐队开始演奏波兰国歌那活泼轻快的玛祖卡旋律时，我的心被一种年轻的悲伤所穿透，这种悲伤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突然停住哭泣，试图屏住呼吸以抵抗这种疼痛。我拼命地想让时光停步，想用我的意志之力去止住航轮的移动。我正在经历生命中初次的、严重的乡愁，或 *tesknota*——波兰语中一个在乡愁的意思上再加些悲伤、渴望回归色彩的词。这是我命中注定要深切了解的一种情感，了解它微妙的层次与色泽的轻重。但在这踌躇不已的时刻，它突临于我，就像是一种来自全新情感域界的造访，一种对背井离乡可能会造成多大的伤痛的宣告。或者说是一种对缺失的预诫，因为在这分离的时刻，我心中充满了我将失去的一切：克拉科夫的意象——我爱它就如爱一个人，那阳光烘烤着的村庄的画面，在那儿我们度过了多少夏季的假日，那些我与钢琴老师一起细读音乐选段的情景，还有我和我的朋友们兴之所至的聊天与任意妄为。展望未来，我看到的是一片巨大而寒冷的空白——一种想像的暗化与消解，犹如相机的快门啪地关上了，犹如沉重的帷幕垂下，遮住了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加拿大——我对此一无所知。只有一些模糊的轮廓，觉得它有北美的半个大陆，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战争期间我父母藏在一个枝叶遮盖的森林碉堡里，那时父亲随身带着一本书，叫《葡萄干飘香的加拿大》。那本书，在他那些恐怖的闭门不出的日子里，向他述说着那庄严广大的荒野，无人追捕的徜徉着的动物，还有那自由。这是我们去以色列而选择去加拿大的部分原因。我们大部分朋友都去以色列了。但对我而言，‘加拿大’这个词与‘撒哈拉’有同音回响。不，我心里就不情愿被带到那儿去。我不愿意被强制带离我的童年，我的欢乐，我的安全感，以及我想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芭特蕊”号起航了，雾角发出了低沉的号声，但我的个人存在却进入了一种拒绝移动的状态。父母把他们的手安慰性地放在我肩上；那一刻，他们不得不承认，离别是痛苦的，有得就会有失。

多年以后，在纽约的一个时尚聚会上，我遇见了一个女人，她告诉我她曾有过的迷人童年。她父亲曾是一位驻亚洲某国职位颇高的外交官，她的生活曾环绕在极度的优雅、谦恭的仆人以及长者们的精心护爱之中。难怪，她说，在她这部分生活结束时，她十三岁时，觉得自己被逐出了天堂，自此之后，一直在寻找它。

这也难怪啊。但神奇之处更在于这天堂是可以用什么建造的。我告诉她我是在克拉科夫的一个破旧的公寓里长大的，跟我家另外四口人挤在三个小房间里，周围充斥着争吵、黑暗的政治传言、战时的苦难记忆，以及每日为生存而作的挣扎。然而，当离别时刻来临，我，跟她一样，也感觉自己被逐出了那伊甸园的快乐与安全的所在。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微风吹起的窗帘与偶尔驶过的车辆在那儿投下了缓慢移动的光影。我努力让自己别睡着。醒着多美，那样我就可以推迟意识的失落。我舒服地裹在一张巨大的丝绣鹅绒被里。房间的另一角是我妹妹的摇篮床。隔壁的房间，也就是“第一房间，”传来我父母均匀的呼吸声。我家的佣人——那些接连不断来我家做工的农村女孩之一——正在厨房里睡觉。这就是克拉科夫，1949年，我四岁，我不知这样的快乐正发生在一个不久前曾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一个我父亲不得不在除了微薄配给的肉与糖之外想方设法给我们多弄些食物的地方。我只知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那儿就是我的一切。而天花板上的那些图案足以让我心满意足，因为……哦，就是因为我知道，因为这世界存在着，且如此温柔地飘入我的心房。偶尔，隔几条街远的地方，传来有轨电车的轻鸣，我心中因此充满无限的满足。我喜欢坐有轨电车，那种令人振奋又不是过快的摇摇晃晃，我喜欢在我床上，听着远处那条街上有轨电车在开动；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我在克拉科夫，我在克拉科夫，对我而言，那就是我的家，也是整个宇宙。明天我会跟妈妈一起去散步，我会知道怎么从卡兹米尔扎·威尔克勾街，我们住的那条街，走到乌尔泽尼扎街，我会去那儿看我的朋友柯蕊西亚——那种对散步，对在那条仍会拥有一个又一个惊喜的路上来来回回散步的期待，已让我充满欢乐。

慢慢地，景象与声音都消退了，那些我给它们命名的词在脑海里渐渐变模糊了，我尽可能长久地观察着，那种进入睡眠状态的微妙过程。这种对逐渐进入另一状态的感知也是一种快乐。

每个夜晚，我都会梦见一个小个子的老女人——一个干瘪的芭芭雅嘎 芭芭雅嘎 (Baba Yaga)，斯拉夫民族童话与传说中的神秘邪恶的女巫。，半是外婆，半是巫婆，身披一条黑色的围巾，远远地，弓腰蜷缩在我们院子尽头的一张小板凳上。她是无比的老，无比的小，从那院子的尽头——而那院子也变得无比的深——她透过那智慧而充满恶意的眼隙看着我。不过，或许，我就是她。或许，我已在这地球上很久很久了，所以我能明白她的眼神。或许这种幼稚的伪装只是一个梦。或许我是被芭芭雅嘎梦见了，她自时间之初就在这儿，而我是从她古老的外壳里朝外看。我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不变与可知的。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母亲正在揉面，或许正在缝补我毛衣肘位上的一个洞，可是突然地，她开始低声哭泣：“她就是在这样的一天死的，”她说，怜悯地看着我，仿佛我也包括在她的悲伤里。“我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

我知道她指的“她”是谁；我觉得我好像一直知道。她是我母亲的妹妹，战争中被杀害的。我母亲的所有其他家人也都被杀害了——她父母、表兄妹、阿姨姑婶，但唯有这妹妹，有关她的记忆带给我母亲最切身的痛。她是那么年轻，十八或十九岁——“她

还没来得及好好生活过呢，”母亲说——而她却以这么恐怖的方式死了。那个看见她走进毒气室的男人说，她是那些不得不先为自己挖好坟墓的人之一，死前一天她的头发全变灰了。这让我觉得像一个童话故事，但比格林童话中的任何故事都更残酷、更魔幻。只不过，这是真的。但这是真的吗？它没有那种像克拉科夫有轨电车般的显见的真实。或许这可能根本没发生过，或许这只是个故事，一个故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它也能被改变。那男人是唯一的目击者，或许他误把别人当作我母亲的妹妹了。在我脑海中，没告诉任何人，我下定决心，我长大后，要走遍天涯去寻找这位阿姨。或许她就住在或移民到了我听说的某个奇怪的地方，比如纽约，或委内瑞拉。或许我会找到她，并带她去见我母亲，以抚平她心中的痛。

这个阿姨几乎如影随行般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我自己的妹妹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阿琳娜——而我母亲对她这个小女儿经常怀着一种奇怪的同情，好像因为用了这个名字，她就把一些命运的可怕负担加到了她身上。“有时我为她心痛，”她告诉我，“不知为何，我替她害怕。”我也传上了些这种恐惧，把妹妹看作一个十分脆弱的、需要我全部的爱与保护的小生命。可是我母亲，在我看来也很容易崩溃，仿佛她只是暂时死里逃生，随时都可能又被抓回去似的。死是如此汪洋的大海，而生却只是如此脆弱的一片陆地。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几乎所有我的朋友都没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有轨电车上，我看见那些失去部分肢体的人——一想到他们的生活有多艰难我就害怕。我得出结论，长大成人，就是接近死亡。只有我父亲，战争期间他凭着自己的体力与纯粹的求生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父母的生命，他看上去健壮有力，足以抵御这无时不在的、来自死神的拖拽。

我父亲矮小结实，当然，在我眼里他非常高大，年轻时，他曾获“健壮如牛”的美誉。我后来听说他唯一一次被人看见掉泪是在我出生时。不过，我的生命据说也几近死神；我是战后两个月时出生的。母亲身怀重孕时，父母从利沃夫长途跋涉搬到了克拉科夫。那是因为利沃夫在二战时被随随便便地从波兰划入俄国了，而克拉科夫则是离那儿最近的波兰大城市。我父母旅行时乘坐的是一辆摇摇晃晃的大卡车，车上装满土豆袋以及其他一些要尽快穿过新国界的人。为了保住旧国籍，他们宁可背井离乡。因此，在这些劫难之后，在从恐怖中恢复过来并有望过上正常生活之时，我在一个城市医院的安全环境里的出生，对我父母，一定至少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父母极度渴望重新开始生活。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高兴，把“那一切”都留在他们身后了，多么激动，偶尔还会见到本以为已离世的人从这儿或那儿重新冒出。那样的快乐一定是何地寓意深刻！我父亲很少表达内心隐藏着的丧亲之痛，但有时我也能感觉到。他曾询问能否用他母亲的名字来命名我，尽管按规矩，第一个女儿是应该以母系中最近去世的那位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我父母有太多的亡者需要悼念，于是他们就同时以祖母与外祖母的名字来命名我——爱娃·阿尔弗雷德——两个我只有最模糊印象的女人。战后甚至连她们的照片也没保存下来：与过去的切断竟是如此彻底。

我父母只告诉我极少的有关他们战前在扎罗瑟（利沃夫附近的一个小镇）的生活，仿佛战争不仅抹掉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实在的世界，也抹掉了那段生活与他们新环境的联系。“唉，我们只是些普通百姓，”父亲在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时曾这么告诉我，避而不谈那他们那一大段生活的意义。因此只留给我一个轮廓粗略的印象。我父母都出身于有声望的商人之家。父亲是家中娇惯的儿子，村里的浪子，在街角追逐女孩子，高中也没

读完，因为他什么也没学好。我母亲家则更正统，但即使她是个常常得奖的学生，她父母也不让她上大学，而她自己是多么想上，也很想学小提琴，她的一个老师曾愿意无偿给她上课，因为觉得她挺有乐感。她也不让穿露肩露腿的衣装，不让单独与男生说话。我不清楚我父母的恋爱是怎么谈的，但我知道我母亲决定跟我父亲——村里有名的坏男孩之一——结婚，是一种相当叛逆的行为。母亲自己的这种经历灌输给她一种坚定的——在她那个时代，也是令人吃惊的——对追求“娇柔女性”的抵触，在我的少女与青春时代，她不太教我如何做饭缝衣，除非这些技巧会阻碍我去做更多有趣的事。

我父亲，我想，大概是太高兴了，误把自己的头生孩儿当成了儿子，在很多方面，他往往像对待小男孩一样对待我。他喜欢看我穿“运动装”——也就是短裤或长裤子——剪齐耳短发。总之，他要我运动型——擅长比赛与各项体育运动。因此，在我家的“第一房间”里，他教我如何做“体操”，一种类似杂技的练习。当时这一运动极为流行，可能是因为群体运动的号召，健康的体质当时是“新人”新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人”的特征。在户外，他试着让我投入尽可能多的运动。有时他的教育方式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大约是我五岁那年，他给我买了辆男孩子的自行车，那车对我来说太高了，我刚一学会如何保持平衡，他就把我一推，大喊，“快！快！快！”一直到我冲翻在地。他以传统的老法子激励我学游泳，把我投入河中，自己则站在附近的桥上观看，直到我几近淹没，然后带着受伤的自尊，满嘴是水地钻上水面。他带我去克拉科夫的户外溜冰场，拖着我以最快的速度在天寒地冻中转圈。他还为我和我妹妹想出了一个更快乐的主意，那就是买一个呼啦圈。当时呼啦圈正热，直接从美国进口，以一种象征的力量在克拉科夫引起轰动。那时波兰街头到处可见长蛇般的购物队伍，而父亲是通过加塞才买到这一不可思议、谁都想要的货物的。父亲颇有加塞的天才，但这回由于此物如此稀缺，有人甚至整夜排队等候购买，他这一大胆举动招致了群愤与攻击。但无论如何，他把一个橘黄色的塑料轮子带回了家，当时在我看来，为此冒任何风险都值，因为这圈儿令我在学校的朋友堆里极受欢迎，我们几小时几小时地试着让它在臀上、腰上、颈上转，并且举行比赛，看谁能转得最长。

然后，大约我十一岁时，父亲弄到了一辆摩托车。啊！摩托车！这件稀世宝物是从俄罗斯来的（日常交谈中没人叫它苏联），1956年我父母去了那儿一趟，也是唯一的一趟，去购买一些战后波兰买不到的稀缺物品——一个冰箱，一个真空吸尘器，给我妈的一件毛皮大衣——还有这个又大又笨的机器，它立刻成了左邻右舍艳羡的对象。当时我们认识的人中还没一个拥有任何机动车辆的，更别提汽车了。克拉科夫鹅卵石街上的交通主要是有轨电车与马车，尽管在城市最繁忙的路段偶尔会看到几辆排成行的汽车，看上去速度开得极快。

现在我也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快速的滋味了，因为父亲一学会开摩托就先选我作伴，随他去了一趟乡下。在母亲忧心忡忡的抗议声中，我爬上了他身后宽宽的座位，摩托以一阵敲鼓般的轰鸣发动起来了，于是我们出发，在鹅卵石子路上震个不停，在延展的沥青路上顺畅滑行，然后，一进入乡村宽阔的大道，就以最令人激动的节奏与气势加速。这次冒险活动我们总共摔了两次——像往常一样，父亲莽莽撞撞而不是那么循规蹈矩——不过我们爬起来时只发现膝盖上撞破一两块皮，我根本不在乎。我当然也不怕真有什么事故发生，因为我对父亲太有信心了——事实上，我太喜欢父亲像对待好友一样地对待我了。那天我凯旋而归。

“布拉玛拉玛丝则瑞米瑞，若图莫图 普利姆里，”我用一种讲故事的声调说着，好像我正开始讲一个漫长的故事，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发出的只是一串无意义的音节而已。“你在说什么？”妈妈问道。“什么都说，”我回答，然后又重新开始，“布拉玛拉玛，丝则瑞米瑞...”我要讲‘一个故事’，讲每一个故事，一下子把什么都讲出来，不是什么特别的、用我知道的词所能表述的，我试着将所有的声音卷成一个，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音节，好像它们能变成一条语言的莫比乌斯带 莫比乌斯带 (Mobius strips)，是一种拓扑学结构中无穷大的符号象征，它只有一个表面与一个边界，但一个人若站在它的表面沿着他能看到的“路”走下去，就永远不会停下来，里面可包容万物。不过这样的游戏甚至也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那些声音得跟真的音节相似，它们不能分解成粗鲁的噪音，要不然我根本就不想说了。我要的是衔接——但得是那种一下子能说出整个世界的衔接。

我们在我们楼下的街上玩跳房子，或是玩一种带把手的滑板，妈妈的脸出现在窗口，她叫道，“爱娃，得回家了！”少不了一番抗议，然后才跑进去；进门处，像往常一样，被费里尼——我们公寓的管理员——那肥胖的身子挡住了，她那一双巨乳从松垮的裙子里几乎全冒了出来。我想侧身挤进去，但她生气地咕哝着：“这小犹太人，她还以为自己是谁，”我跑上楼，一半感到惧怕，一半又对这母老虎似的庞然怪物感到好笑。

我们那套简陋的公寓按战后波兰的标准来看相当不错，至少是因为我们自己拥有一切。厨房里总是蒸汽腾腾，柴灶上的大锅里几小时地熬着汤，或者总有衣服放在大缸里煮着漂白；厨房后面是个小阳台，仅能容下两个人，我们有时会走到那儿，跟那些摘理蔬菜、拍打地毯的邻居闲聊，互通家长里短，或就在毗邻的阳台交界处闲站一会儿。朝下看，是一个铺砌好的院子，我在那儿不知度过多少时光，与其它孩子一起对着墙玩球。底下还有一小片花园，每年春天，我去那儿闻一闻开放的紫罗兰，爬一爬苹果树。我妹妹则在博伊森莓丛下找蜗牛，骄傲地满桶满桶地往家拎。

除了厨房之外，我们的套房里还有“第一房间，”里面放着一个桃花心木做的大衣柜，一个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蓝色瓷瓦炉，一张我们用餐的饭桌，以及我父母的沙发床。“第二房间”是我和我的妹妹的卧室。浴室内有一个煤气炉，用来加热洗澡水，但用它准备热水澡相当费力。每年入冬时，都会有一个农民装束的人给我们送来煤和柴块，以供整个公寓楼使用，有时我会被派到地下室去取柴，那是一个黑暗、潮湿的地方，进去前我总是紧张地先朝里张望，然后快快地从我们那一堆儿上取一些，装满我的两只木桶。

三楼则总是充满谈话声、串门声与闹剧。那母老虎般的楼道管理员嫁的是一个又瘦又孤独的男人，她永远对他大喊大叫，有一天竟用刀子将他刺伤。那以后，他比以前更悲哀地萎靡不振了，跟谁都不说话，一个人在屋顶下的那个大阁楼里养鸡。那鸡叫声与飘飞的羽毛将整个阁楼变成了一个布鲁诺·雪尔茨的超现实主义实验室，我被那儿深深吸引住了，仿佛那是个充满奇异魔法的地方。

楼下另一套房子里住着一个鞋匠，他更有古风，喝醉了就打老婆。大家都听到过那充满皮革味的店里传出的她的哭声，一提到这对夫妻，每个人都怜悯地摇头。但没人感到惊讶。老公有时打老婆。这就是生活。

然后就是那些真正的邻里——各家的孩子来回串门，互借糖盐，下午茶时一起聚聚。二层的扎考斯基家，家境“较好”，意思是他们有些战前的威望：也许他们曾很有钱，

受过教育，或有受尊敬的职业。扎考斯基是个憔悴但长相俊俏的男子，常常生病，但即使在病床上，他也热切地谈论着他们为“我们的祖国”做了些什么，好像试图将一些信息烙进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才知道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瑞梅克家是我们街区第一家装上电话的，自那以后，总有几个人在他家小小的门厅里等候机会使用这一玩意儿。我们过道对面是特瓦道斯基家，他们时常来我家谈论政治，听“自由欧洲”广播节目——这种时候我家的前门总是小心地锁好——我们讨论透过无线电的干扰杂音能听清多少信息。我特喜欢特瓦道斯基家的女儿，巴西亚，她比我大几岁，大辫子又长又漂亮，有时高高地盘在头顶；没人管我和我妹时，她常跟我们呆在一块儿。她想学医，给我们看医书，里面有些可怕的人体部位与疾病的插图。我常跟她讨论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比如，自己死或身边的亲人先死，哪个更糟。然而，有一天，我去她家借东西时，发现她正被打屁股：她被横放在父亲的膝上——那时她快十六了一而他正用一根皮带有条不紊地抽打她的屁股。我进去时他也没停，弄得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站在那儿目睹整个羞辱过程，直到巴西亚被允许走开。从那以后，她不再像老朋友一样跟我说话了。

所有这些故事发生的那座楼，是在卡兹米尔扎·威尔克勾街 79 号，它坐落在城市的边缘。在那交界地带，城市的楼房开始让位给一些小小的农村平房，一块块的菜园，以及野草覆盖的无主之地。正如我们居住的公寓，我们自己也临界于中产阶级的边缘，处于一种水陆两栖般的，中间交界的位置。事实上，这对我父母来说挺好。他们跟别人一样，挺清楚社会阶层那种微妙敏感的分，但他们的抱负并未因此而受影响。在战后波兰的混乱中，他们干得不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我父亲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上班的辛苦，他更喜欢自谋职业的冒险，虽然这是不合法的。他在“进出口”商店有一个正式工作，但他真正的智谋却用在冒险的挣钱行当上：倒卖黑钞美元，或从东德走私银货。他是大量从事这类游戏的人之一。事实上很多波兰人都在做着这类钻制度孔子的游戏。基于人民对制度的态度，这类游戏反而被认为是又体面又刺激。差不多每个人都涉及这类非法活动：兼职，或用工厂的设备下班后为自己捞点好处，或去匈牙利倒卖点他们那儿没有的东西，比如床单或塑料梳子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塑料制品极吃香），以换得那些禁止买卖的值的美元。不知那些不干这类副业的人如何过日子，因为正常的工资几乎无法养家，更别提给家人买衣服了。

因此，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会不时地消失数天，又会同样出人意料地再现，他将那令人振奋的香烟气味，他阔气的皮大衣，以及外面的世界带进我们公寓。通常，他回来时，母亲跟他就会用犹太意第绪语严肃交谈——那是金钱与秘密的语言。但直到我们即将离开波兰去加拿大时，父亲才让我看他在我家镶木地板上做的一个拼图，打开后可见一小块隐藏之地，多年以来，他一直将他的外币藏在那儿。

这真是相当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伙伴被判刑发配到了西伯利亚——但父亲乐此不疲，因为他在波兰崎岖不平的路上以最高时速骑摩托车时感觉特棒。也正是他的非法活动，让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意味着我们也许可以每月去餐馆吃一次饭，暑期可以休长假，有一个住家的女佣，以及不止一件可换洗的衣服，偶尔还可以买点进口货品，像我母亲的细高跟鞋，或我的尼龙上衣。

我母亲，毫不张扬地，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时尚的夫人，过着一种愉快热闹的生活。她有一个女佣帮衬家务，她每天带着我和我妹妹去公园，在那儿交新朋友。她读书，带

我去克拉科夫一家可爱的咖啡馆吃冰淇淋，也给我父亲的生意出谋划策。我们去戏院、歌剧院、电影院——只要我们价格负担得起——轮流不断地去。有一阵，我父母感到挺满足，很高兴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中心，有文化，有生动活泼的谈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

当然，我父母还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事实上，他们很有雄心，特别是对我这个聪明的、才华渐露的长女。但他俩都不很清楚怎么才能得到那些其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可能是什么，比如为此他们得付出多少努力，得给孩子立下多少规矩。事实上，不管以后我父母会获得多少中产阶级生活的装备，他们始终不会接受其职业道德。生活对他们而言曾是那么非理性，因此足以让他们相信赌博的力量——他们更愿意相信冒险游戏中的运气，而不愿循序渐进。再说，在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没有所谓的循序渐进的事。每个人都很清楚你那样做不会得到什么。只有笨蛋或傻瓜才会在你“选择的行业”里努力工作，因为这行业通常是别人为你选的，没有报酬，没有改善生活境况的可能性，并且明天什么都可能发生。这种制度——混合着波兰人经年累月积存下来的对所有制度的怀疑——生产出了一民族的讽刺家与赌徒。

但是，除了应对日常必需的劳作之外，我父母也继承了一种古老的观念——这观念源于几百年来艰苦而非自愿的劳动——那就是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获得足够的休闲。我母亲不那么隐藏她对懒惰女人的羡慕。懒惰显示了性格的某种奢华，一种重视快乐的性感。“你知道，奥绵斯卡让她在厨房里的女仆过来拿火柴，而那火柴就放在离她十厘米远的地方，”母亲说，口气半是批评，半是羡慕。这种利己主义是女性权力的核心，那就是有能力让别人为你做事，自己则可以宠着。我母亲并非是唯一持这一信念的——相信某种自私是恶习中的最性感的，就像女王似的那种德性。以后，母亲会惊奇地发现我愿意花费多少能量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她无法弄懂——谁又能责怪她呢？——为什么我会如此匆匆，我那么努力到底要去哪里。

在某些方面，我父母的人生态度中会一直保留着一些前都市化的东西，一些不属于这个工业化世界范畴的东西。但同时，战争——他们的再生之地——迫使他们以横跨深渊的飞跃方式，进入了现代。大部分他们原来习于遵从的观念与信仰已在极端痛苦的碱液中锈蚀掉了，取而代之的正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虚无态度。他们不太尊重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维多利亚式的与东正教的腐旧道德观的残留都已被解除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不易受惊的；他们已丧失了一种传承的、不容置疑的道德上的清白。唯一剩下的是一种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深深怀疑，以及一种存在主义的土生版本——一种战争产生的哲学，无论如何——都得赌一赌，既然一切都是荒谬的，就不妨试着在每一时刻中挤出果汁来。他们热切地希望幸福，并渴望他们的孩子也要快乐，无论如何都得快乐。事实证明，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相悖的行为准则。

我慢悠悠从学校往家走，一路玩着游戏，这种游戏就是不能踩到路面石块之间的缝隙上。太阳也正玩着线条与阴影的游戏。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一刻，这一刻我往家走，随着时光走。但，突然，时光带着悲伤穿透了我。这一刻不会持久。我任走一步，一寸光阴就随之消失。很快，我会到家，然后这一切，眼前崭新的一切既成过往，我想，时间似乎在我后面藏躲，像一股看不见的电流被吸进一个无形的旋涡。怎么会这样，这丰富的一切，这街上的我，这一全然充盈的时刻，会消失吗？这就像那次我打破了一个大瓷娃娃，无论我多么想把它变回原来的那一整个，它也还是破碎地躺在

地板上。我无法做任何事把它变回原样。我生命中有多少这样的时刻？我听着自己的呼吸：每一次呼吸，我都更接近死亡。我放慢脚步：还没到家，但很快会到了，现在我更近了，但还没…还没…记着这一点，我命令自己，似乎那样就能让其中的某些时光留住。你长大后，会记住此时此刻。你会记住你是如何让自己记住的。

我浮躺在快速流动的河面上，任那充满泡沫的激流带我自由飘动。我感到一种轻微而令人欣悦的冒险的刺激；被激流包围着，感受它的能量与流动，真好。然后，我胜利地站起来，跑到岸边，加入家人与朋友的聚会。那儿有我母亲，她最好的朋友，Pani 茹塔——Pani 的意思是太太或夫人——以及其他几位太太与她们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因放不下工作，只能来共度一部分夏天。女人们坐在绿色的河岸边，背对整齐的方形麦田，打牌，读书，或什么也不做。与我们一同从克拉科夫来的女佣们，要么准备午餐，要么在其它地方消遣。

我们有一个约四个家庭组成的小团体，常常一起度假。连续几个夏天，我们都到塔特耶山脚下一个叫碧雅维·杜纳耶茨的小村庄，租下几间农房，与世隔绝地过上九到十周无比轻松的休闲日子。整个事情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如何到达那儿，因为这个村落很原始，我们不仅得带上夏季衣物，还得带上一串与文明相关的用品，比如摇篮、松软被褥、锅碗瓢盆及大量的书籍。每年夏天的一个晴朗早晨，我们都会起得很早，乘出租车去火车站——这在我们生活中是罕见的事！——然后，忙忙碌碌地，将我们带的一切都装上火车。于是我的夏季心情也随之酝酿好了，伴随着火车不规则地重复着的节奏，我旅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迷迷糊糊的。眺望窗外，是整整齐齐的农田，一排排的白杨给我平静有序之感，阳光将干草堆烘烤成金色，正在劳作的农民们直起腰向路过的火车挥手致意。

我们在碧雅维·杜纳耶茨小村庄租的房子是歌乐人的，这是一支山地部落人，说的波兰方言与我们的有些不同，他们以凶猛的习俗著称——部落里的很多男人带着一把小巧玲珑的斧子，别在腰际，有时，婚礼或其它节庆后，我们会听到一些打架的事件，那时，这类器械往往就被当作武器来使用。不过我们这些城里人，这类故事只能是通过村上的小道消息得知的。我们的住房相当简陋，木地板不曾打光，床垫里伸出尖尖的干草，粗糙的木桌上放着油点的灯。房间里散发着一股美好而强烈的生木干草味与清新的山林空气，屋外有一个小小的、随意种植的花园，看上去包括了所有生活需要的植物种类：很多色彩缤纷的三色堇，甜豆花直往屋墙上爬，莳萝散发着清爽而强烈的香味，还有硬硬的、明亮的小萝卜。偶尔我们来摘些小萝卜，和着黑麦面包作早饭。

清晨，我走进谷仓，去看那些农妇，她们穿着又长又宽的裙子在挤牛奶，或在小木桶中搅动着黄油。她们很少对我说话，相互之间也不说什么，但我喜欢靠近她们坐着，看着她们辛苦而又充满耐心的动作。有时我站在一旁，看她们在清凉的溪水中洗衣，看着那亚麻布衣在清水中闪动着耀眼的白。傍晚时分，我与马瑞克在附近的森林与田野中奔跑呼叫，发明新的游戏，发现不曾去过的地方。马瑞克是茹塔阿姨的儿子，我们婴儿时期就互相认识了，我们在公园里跑步比赛，互相串门，一起练钢琴。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是这关系里还有个曲折部分——我爱他。我不能离开他，即使他有时对我玩男孩子的恶作剧：有一次经过他家窗下时他把一本巨大的旧书扔到我头上，另一次，他把我塞进一个森林的洞里，后来发现那是德国人留下的，里面可能还有地雷。

有一段时间，他变得那么野，以至于我母亲都不让我见他或跟他玩了：但这一点用也没有——我一有机会就往他家跑。我们没完没了地聊天，跟别的小孩玩游戏时，我们

总是站在一边。有时，傍晚时分，我们穿过森林爬上一片开阔的充满鲜花的草地，加入一群光脚丫的农村孩子们，跟他们一起用野火烤土豆；那烤焦的土豆皮在夜晚的空气中尝起来美味无比，吃完后，我们就用扭曲的老树根做成黑暗小径上的阶梯爬下来。或者，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站在瀑布底下，让衣服完全湿透，那种时候，我充分感到自己精神中狂野的一面，也感到与马瑞克在一起的安全。尽管我们相互玩着这些危险的游戏，但我深信他强壮的身体在那儿保护着我。

当干草收割的季节来临时，马瑞克与我就跟全村人一起，坐着带响铃儿的马车，到那堆满一垛垛又矮又大的干草堆的田里去。我们在那些干草垛里打洞的时间跟我们用草叉子干活的时间差不多，但农民们工作得很辛苦，一直干到正午，那时村里一些妇女会送来午餐，有土豆、香肠与酸奶。饭后他们又一直干到日落，然后我们再次爬上马车，而这时马车上的干草已堆得像座小山了——这垛儿如此之高，几乎要碰到那个冬天库存干草的仓库的顶部了。干草卸下后，我们就在库顶的小阁楼上玩，那儿散发着马儿与新鲜干草的温暖气味。

常常，当大人们打牌或聊天时，我一个人躺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仰天看着浮云，感到无限满足。有时我喜欢独处，想一些不算什么想法的想头，对着蓝天发绿思。日落后我喜欢在穿过香香田野的窄窄小路上散步，当星星开始闪现，地平线渐渐消失，融入恢宏的天碗，寂静好像就为我轻吟，这一切就在我的内心创造出巨大的寂静。

星期天，乡村生活的热闹声都停止了，但十点光景，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来了，一支严肃的长长的队伍在不曾修整过的乡村主干道上缓缓移动。村民们在这样的场合都穿着鞋，穿着周末节日才穿的衣服——女人们的白衬衣上都绣着花，男人的头上戴着镶有硬黑宽边的帽子，帽上还斜插着一根羽毛。他们以缓慢而相同的节奏一起走着，嘴里还哼唱着关于耶稣与圣母玛利亚的优美简单的曲子。

夜晚，当我要入睡时，有时会听到村民们从田野草地归来，唱着尖利而纯粹的莫尔代歌曲，我从来没听过这一类的歌——于是乡愁涌上我的心头，虽然我不知为什么。

我躺在摇篮里，摇篮放在我们客厅的桌上，Ciocia 布若尼雅用她那双粗糙的大手为我洗澡。这双手让我感觉真好，我喜欢她把我裹进毛巾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小巧的动物。接着她把我的头发擦干并揉成波浪型，那样我看上去“象花朵一样美丽。”

Ciocia 是“阿姨”的意思，但我知道她不是我家的真亲戚，她在我家有一种界限很模糊的地位。她的社会地位很低——这我清楚——但她在我父母的情感中占有一种特别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毕竟，战争期间是她将他们从饥饿的边缘拯救出来的；或许她帮忙救了他们的命。

战争最后一年，在我父母躲藏的一所房子里，他们结识了布若尼雅阿姨。此前他们藏身的那个森林碉堡被一些乌克兰人发现了。尽管那些偶尔经过的路人都保证会替他们守秘密，但我父母还是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很多乌克兰人是站在德国人一边的。后来我父母的预感被证实是对的；在那种处境下，这样的预感只能是对的。几天之后，当地的盖世太保就集中搜查了该地区；好在那时，我父母已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房的人了。母亲给我描述了那个农民，实际上是他们的恩人的奇怪形象——小气，几乎是个哑巴，还是个驼背。他那两个强壮的儿子都属于班得若刺（Banderowcy）——一个亲德法西斯党徒组织。然而，这样一个阴郁的、看似粗暴的人，开始对我父母产生同情并依恋，当离别时分来临时，竟有些难舍难分。“人真是不可貌相，”说起他时，母亲

总是若有所思，有时，泪水盈眶。

大约有一整年，我父母隔离在这个男人的小阁楼里，大部分时间就坐在一堆干草上——又冷又饿，身上爬满虱子。也就是在这儿，有一回父亲看到德国人走近了，大概是要搜索房子——父亲不加思索，就要从后窗跳下。他想拉上母亲——可是她拒绝了。“我不再在乎自己是活是死，”她告诉我。“那种时候，你就是什么都不在乎了。但你爸，他那么想活下去。就是这种求生的欲望救了我们。”那一次，德国人被引走了。

也正是在这所房子里，父母认识了布若尼雅阿姨。她表面上是个女佣，替楼下那个富裕农民干活；但一天，她对我父母透露了一个危险的秘密——她也是犹太人。她来自很远的地方，所以本村无人知晓，她看上去也极像波兰人——大骨骼，宽脸盘——所以很容易能混过去。

从那以后，只要她能够，总会给我父母带来一些剩余的面包和菜汤。那乌克兰人从未发现，他家还藏着另一个犹太人。

战争结束后，我父母与布若尼雅阿姨，都失去了家人，于是他们就呆在一起了。在利沃夫停留了几个月后，他们又一起前往克拉科夫。他们都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宁愿呆在波兰，也不愿呆在新俄罗斯。

所以，现在布若尼雅阿姨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与我们同住过的几个女佣中的第一个——她之后的都只是些简单的女佣——睡在狭窄的厨房里的一张的狭窄的床上。她是我父母与他们战前的过去及战前波兰犹太小镇里的社会阶层的唯一联系。是的，几乎算得上是个亲戚，只是我母亲来自一个富商家庭，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布若尼雅阿姨将永远只是个贫穷的犹太人，几近一个农民。我母亲读书很多，有时，当我在“第二房间”假装睡觉时，我听见父母跟朋友们在讨论一本新书或电影，一直谈到半夜三更。我不知谈话时布若尼雅在哪儿，也许真的在厨房里睡着了，或只是像我那样只在假寐。布若尼雅不爱读书，也不爱看电影。母亲喜欢跟从流行杂志上的时装样式，有时甚至跟从美国杂志上的——那印有流行款式的几页不知怎么传到了她的朋友圈里。这种事儿发生时，真让人激动得无可比喻。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杂志上的衣服样式——我们也分不清是广告还是其它图片——分析其衣领细节与腰围的皱褶，然后将我们选择的样式交给裁缝，她则会尽其所能地模仿。

布若尼雅从不化妆；她的衣服，总是些华丽的印花棉布，松散地挂在身上；她也不知如何穿尼龙长袜。她从不打开报纸，说话时夹着叹息与自言自语。“她有点原始，”母亲用一种与我同谋的声调对我说。“这么迷信。来月经时都不洗身体。”可是当我母亲怀孕时，布若尼雅试着用纸牌预测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双眼放光，等着预测结果。至于我，则完全相信——尽管我不再记得预测结果是对是错。

我充分信任布若尼雅阿姨——信任她给我的洋娃娃做的衣服，信任她早晨喂我的沾过牛奶咖啡的面包。但我知道我不必像听从母亲那样听她的，我也知道她看待我就像看待一件更为精美的创造物，对我百依百顺。“我的小猫，我的公主，我金色的宝贝，”她加重声调，于是我觉得自己特受重视——不过我也感到一种温柔无私的爱，几乎我是这种爱的源泉。

我七岁时，布若尼雅阿姨跟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结婚了，她搬到了布热丝劳(Breslau)，一个我不想去玩的地方；那还是个布满废墟的城市，而且她丈夫，一看见我胸前有点可捏的就居然来捏一捏。母亲觉得布若尼雅应该很快乐；我相信以她那安静和平

的方式，她一定快乐。毕竟，她从未期待过有个丈夫，成为自己房子的主人。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成就，是她可以感到满意的一种成就。

布若尼雅阿姨对我家一直忠心耿耿，即使隔着那天远地远的大西洋。在加拿大，我们收到她充满拼写错误的信，信中她请求“她亲爱的爱娃”给她写信；但我从来不写。我知道，我根本无法将我的新生活的本质传达给她，再说她是那些只会引起我乡愁之痛的众多情感因素之一，因此我试着去麻木这些因素或将之从自我中解脱开，就像对待那恼人的自责，或拇指中扎进去的刺。

我父亲几乎从未提及战争；尊严对他而言是沉默，有时候是过于沉默。过上一阵子，他发现很多事情已很难去谈论了。当这些事都已成为过去，他才会从这些陈年往事中挑出几件来说一说，而此时这些故事离发生时已那么遥远，以至于听上去就象寓言传说，象詹姆斯邦德冒险记一样。我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发生在父母身上的那种现实？我来自战争，这是我的真正来源。但正如我们所有的来源一样，我无法把握它。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来自虚无。

在他们躲进森林碉堡之前，有一次我父亲也险遭不测。那时他们小镇上搜捕犹太人的风声正紧，维德拉家的三兄弟被悬赏追捕，因为他们一直非常成功地与盖世太保周旋。所以有一天，当我父亲正在路上行走，一辆开往附近集中营的装满犹太人的德国军车经过他的身边时，车上突然有人控制不住自己，愚蠢地大喊，“这儿有个维德拉家的！”执行任务的德国人自然停下车来，叫我父亲上去。那一车人战后无一生还，只有父亲活下来了。因为当德国人停车过夜，把车上的人赶进一些他们指定的房子里时，父亲注意到一扇门上有条缝，就溜出去了。于是他走到后面，朝向森林开始奔跑。几分钟后，传来一阵犬吠，他们追来了。但他跑得很快，一进入森林就把那些狗甩掉了。那个地区他不熟悉，在雪地上来回一直走到天亮，才发现自己已在森林的边缘。一个农民向他走来。父亲不知这个农民的出现对他意味着拯救还是死亡——但那时他再也走不动了。只好信任这个人。后来证明这个农民是好人；他把父亲带回家——他家就在集中营附近，那儿正是交通中转站。有关父亲下落的消息送到了母亲那儿，母亲用一辆车把他接回了家。之后的几天里，母亲告诉我，父亲得了很重的感冒。

他们躲在森林掩体里时，父亲每夜都得出门找食物。有时他会去村里的教堂，那儿的牧师会给他些面包。但有一夜在回家路上，他被两个年轻的乌克兰人抓住了，他们又强壮又醉醺醺，说是要把父亲带到盖世太保那儿去。他们一人一边地架着我父亲的胳膊。但当他们经过当地一条河流的桥梁时，我父亲——“健壮如牛”——用力将他们推开了，让两人摔倒在了桥边的栏杆上（他告诉我这件事时，也用他强壮的胳膊做了个有力的甩手动作），接着他跳进河里，尽管那个季节河水一半是结冰的。他呆在冰水里，并在冰下潜游了近一个小时，直到他确信抓他的人不再追来，并走远了。“唉，”父亲讲完了，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仿佛想把那些记忆甩掉。那有什么关系呢？都发生了，已经发生过了，你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母亲想让我知道过去发生过的事，我把她告诉我的每个细节都象串黑珠子般地串在记忆里。记住它们是一种荣耀，就像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一样。但其实我并不理解我记住的这些事。为往事赎罪，我就得跟她一起重温过去，我努力尝试。不，不能。我无法像我应该的那样去接近这份痛苦。但我也无法跟它拉开距离。

我更年长些时，试着离这些事更远。自然，在她的痛苦上再加上我的，将痛苦加倍

确实毫无意义。而且可以肯定，我从父母的经验中也学不到多少有益的教训：它并不适用于我的生活；事实上还是一种误导，让我变成一个条件反射式的悲观主义者。这就是当时我告诉自己的，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定，跟母亲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有一次，多年以后，在纽约一个热闹的咖啡馆里，我遇见了一个战前与我父母同住在一个小镇的熟人。这是我在另一片大陆上见过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由于一串偶然，她找着了父母，现在要跟我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窥见父母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元故事中——以前在我眼中他们的历史总把他们搞得很典型化。这个女人与我母亲很不同：离婚，独立，工作也更努力。她女儿，想不到跟我那么不一样——一个上着舞蹈课的女商人，毫不关心过去——而这，也是一个意外。我们彼此应该更相似才对；我们曾被同样的‘事’塑造过。那位母亲有一张她自己与其他几个年轻女人的照片——其中有我母亲的妹妹。她们站在冰雪风景中的一座小桥上，穿着皮毛领的大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些，她们抬起头，摆出一副娇娆的天真姿势。这就是她当年的样子；的确，有点象阿琳娜。但照片上的形象并不能多说明些什么，也无法以此来看清真实的她。但我们一起在联合广场的咖啡厅吃午饭时，我父母的老朋友讲了一个我未曾听过的故事：我父母不得不往森林碉堡跑的时候，她重复叙述着，我母亲刚刚流过产，很虚弱，在雪地上跑不动了。父亲只好背着母亲走，一步一步往前挪。又一个需要留存的意象，一粒亮闪闪的得串入记忆的黑珠子。听着听着，我低下了头，意识到，我正是来自这些痛苦的过去的，我想寻求摆脱肯定是徒劳的。

小时候，有一次父亲跟我开玩笑，问我如果他们离婚的话，会选择跟谁，是他还是我母亲。我觉得这是真的了，因为他们经常吵架。看到我惊恐万分的表情，他说，“别担心，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的婚姻就象中国的长城一样坚不可摧，什么也打不破的。”即使这样，我的心灵，也被这一难题的痛苦复杂扭痛了。

大约两周一次，母亲会带我去图书馆，为我借下两周要阅读的书籍。每次，我都充满期待，仿佛要到芝麻国里去旅旅一样。图书馆坐落在一条古老狭窄的街道上，在一座古建筑里，入口的木门沉甸甸的。里面象是柏拉图的洞穴，埃及的寺庙，充满神秘和魔幻的空间，站在门槛边，我感觉自己像个谦卑的辅祭。这里灯光昏暗，烟雾飘渺，粉尘弥漫，掺杂着令人敬畏的窃窃私语。柜台挡住顾客，柜台后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高至天花板。轮到你时，神秘世界卫士中的一个会走上来说你要什么——他们大多是戴眼镜的妇女，穿着护士装式样的黑绸缎服。我母亲会提到一些她感兴趣的作者或书名。至于我——我该读些什么呀？一个冒险故事？寄宿学校读的小说？有关历史的书？仅是对这些可能性的斟酌就已把未来的两周变成了一片潜在乐趣的领地了。于是这位卫士就会悄悄消失于神秘的空间之中，然后重新出现，带回几本充满霉味，已经发黄的书。我打开书，闻着书的霉味，读几行字。有些书有插图，我如饥似渴地盯着看。然后我不得不从阿拉比的财富中作出抉择。

从图书馆出来，往往是走入黄昏微暗的街道，那等待着我的事儿令我陶醉，只要一回家，我就捧起其中的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于是就会有整个晚上都在读书的情形。父母担心我读得太多了——得不到休息；眼睛会太累——有时我躲到桌子底下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我在做什么。有时他们真没注意到。

那些寄宿学校小说，通常是法国的，主要描写那些逃学的坏女孩，晚上溜出去做天晓得是什么的事儿；这些事儿很吸引我，但最后总是那个安静、正派的女孩看来能得到

一个男朋友，所以我得出结论，我得象她们那样——尽管我很后悔，即使只是在想像中，放弃那些令人兴奋刺激的做坏事的可能性。有一本意大利作家写的书，叫《心》，是写一些可怜的人，又聋又盲又贫困，还有一些孩子们，富有同情与善心。这些故事让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有儒勒·凡尔纳的书，有《爱丽丝在仙境》，《怪医杜立德》，还有《你往何处去？》——这些书与学校要求我们读的完全不同，学校的书是关于男孩和女孩，在集体农场共度夏天，帮助他们勤劳的母亲，或抢着做比他们两周的计划要求做的更多的活儿——这些阅读材料就连学校的老师都不会认真对待。“关于劳动价值，你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老师用一种愉快的命令式声调问大家——我们则以疲惫的声音回答着，仿佛我们刚刚卸下一份愚蠢的责任。

但我图书馆的书不是这样的，它们的内容我全然相信，不置一疑。就像所有的波兰儿童一样，大人也让我读不少显克微支的书——他是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波兰国家主义者——尽管以某些标准来看，这些书的内容很强烈。他的历史小说是关于波兰中世纪帝国的艰难，它的胜利和失败，小说中有很多骄傲的波兰美女。我特别着迷于一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有尊严的伯爵夫人。书中的那位英雄不能抗拒她的诱惑力，因为他感到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奇特而又抑制着的力量。还有，我也特别着迷于那些极其残忍的普鲁士骑士披着重金属盔甲哒哒穿过大地的场景，以及由战斗和酷刑组成的场面。常常有这类描述，比如人被钉在火刑架上或被割掉舌头，或被挖掉眼睛，一旦印入我的脑海，就很难消除。

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应该教我一些古罗马的历史和基督教开端的知识，但我读这本书主要是为了书中隐含着的另一方面的知识——性。虽然在描写罗马狂欢时并未提供很多具体细节，但足以引起人既兴奋又焦急的想像，让我睡前浮想联翩——裸胸的女人给斜倚着的男人喂葡萄，人们懒洋洋地相互沐浴，背后还有些我不懂的东西，左思右想，直到哄我自己入睡。

然后，由于一些疏忽或错误，我得到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我开始读这本书就像读其它书一样，直到发现无意中读到了难以置信的让人兴奋的内容。当然，我不“理解”自己正在读什么：但像对其它事情一样，对性该有本能的知識，因为隐士受女人肉体诱惑的场景，以及他偶尔的性交场面，令我热血沸腾；这是一种乡愁（*tesknota*），我想，尽管这是不同种类的。

但正是那些描写更温和、不那么遥远的经验的書——与我自己的世界更接近的书——我才真正在乎。有一天，我打开了《绿山墙的安妮》，其后数个月里，我着迷了。我疯狂地问馆员下册书会何时到达，很担心如果间隔太长——我会无法忍受悬念的牵挂，那就是安妮是否会成为一名教师。我的谈话都是关于安妮，她的慧言趣语与她日常生活见闻——她的朋友，黛安娜，不幸死亡了，吉尔伯特邀请她去散步，她生日时得到了几件有蓬松袖子的衣服，为此她欣喜若狂。只要我读着书，我就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在爱德华王子岛成长的女孩；小说里的话进入我的脑海，好像它们是从那儿发出的。既然我那么生动地经历了他们所描述的，那它们一定就是我的。

像许多书读得很多的孩子那样，我很早就开始宣布，想成为一名作家。但这是我唯一用以解释我不同愿望的方法，而那个愿望是什么，自己也还不明白。我真想要的是进入一个空间，那儿的一切就象我阅读过的故事那样独立，完整，易于理解。而且，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拘泥字义者。我想要让现实模仿书籍——让书籍

捕捉到现实的本质。我喜欢文字，只要它们与现实世界呼应，只要它们给我一种现实世界升华的方式。我的单词越多，我的看法就变得越明了，越独特精确——这样的洞察力是快乐的一种形式。有时候，当我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我让它在舌头上打滚，仿佛我在嘴里将它塑造成形，这个世界上就会生出一种新的形态。什么都不存在，直到它被完全阐明。“她讽刺地扮了个鬼脸。”有人这么说，这时，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鬼脸就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掌握了一条新经验，那是我的。

这些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泛黄的书页，将我吸引进它们的世界，让我恍惚出神——但前提是它们能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模仿幻觉。我觉得我被《爱丽丝仙境》巧妙地欺骗了，因为它全是假装的，是个游戏，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的阅读都是混合着的，我读《爱丽丝》后不久，就得到了《战争与和平》。这是我应该仔细阅读的，是父母交给我的，是一本经典，很重要的——但这种责任的通常令人沮丧的召唤在这段时间并未对我产生影响。我没注意到《战争与和平》是一本书，是正在读的书。当然，这就是生活。

这是克拉科夫的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握着母亲的手，漫步走向我们最喜欢的公园——克拉考斯基公园。但在这轻松的漫步中，母亲的声音改变了语气，仿佛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现在长大了，能理解这些事了，”她说。“现在该是停止在教堂前面划十字的时候了。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这样做。”这来得不那么令人吃惊，真的。当然，从懂事起，我就知道我们是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战争中死亡。但这一认知一直有些模糊、朦胧，我不明白它的含义。得到那么正式的证实，我觉得几乎松了一口气。

身为犹太人的意识渗透在我们住房的各个角落，就像准备哈拉面包发面时从厨房里散发出的重重香味。犹太意识就在这面包里，其他人好像不做这种面包；这也是我们与众不同的标志之一。但七岁前，我常常跨越这些标志的界限；我模糊地保持着这些区别。确实，此前我得到的任何明确的宗教教育，都是天主教的。不这样很难。天主教无处不在：这是我每天呼吸的空气。当愤怒时，或者当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时，母亲就用幽默的口吻说“耶稣，约瑟，神圣的玛丽亚。”在街上，我们经常看到修女穿着带帽的披肩长袍，祭司长穿着优雅的长长的连扣袍。从人们对他们的特别尊敬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们是特殊的，超脱于寻常的规范的。那些与我在街上或在附近小操场上玩的朋友们，都特别关心圣人的问题。达努塔·冬芭斯卡，一个朴实的金发碧眼的女孩，住在我家隔壁的楼里，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有一天我们等着荡千秋时她认真地告诉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圣人。也许是圣·维罗尼卡，或者，圣·特丽萨。她眼里闪动着梦幻的光，显然，这是一个愉快、浪漫的幻想。“我不想成为任何一种圣人，”那时，在秋千上，我坚定地告诉她。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得来这个信念的，但它非常强大。做一个圣人就得躺在白色的衣服里，也许在十字架上。我不喜欢这个仰卧姿势。我想漫游世界，去冒险。或者，也许我之所以不相信圣人，是因为当我们星期天去教堂时，我并不“相信”那儿发生的事。是的，我与达努塔及其他孩子常去教堂；我父母在那次正式宣布之前，并没有阻止我。毕竟他们自己不是信徒，他们不想让我年轻的生命有不必要的困难。让她跟别的孩子去玩吧，这是他们隐含的意思——这也就是当时整个事儿的感觉。这是一种把戏，而所有庄重严肃的服饰让事情更令人满足——好像要玩一个规模庞大的过家家游戏。我喜欢我家附近那个教堂的灰色石墙，曲线优美的巴洛克式外观，香烘烘的内部。我跟其他人一起跪下，唱美丽的圣歌；当一些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从人群中异

口同声地响起时，我感到特别激动。有一次，当我们跪成一排接受祭司的祝福时，祭司把手放在我头上，略有担心地看着我，告诉我，如果我要问他什么，我应该去跟他说。我猜他知道我不属于这里。

我觉得我也知道这一点。对于这些星期天的活动，复活节穿得漂漂亮亮，拎着装满兔子糖果的篮子去教堂的趣事，我猜想每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尽管我和别的孩子们在这些活动时的表情都认真严肃。所以有一天当达努塔跟我说起上帝——他的好处，他对罪恶的不原谅，及他的宽容——她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梦幻般的、极度认真的表情时，着实让我很吃惊。我认识到她真的相信，上帝就像她的邻居一样真实。我敬佩地看着她——也许她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上帝的形象，没人教我该如何去想像上帝的样子或去爱他。

我们的佣人们做了更具体的努力，试图给我灌输一些基督教情感。第一个是个新来的农村女孩，很害羞，像只小鹿，——但与我们住了一阵后，有时我父母晚上不在家时，她会来我房间，蜷缩在我床边，跟我讲耶稣与圣人们的故事。其中有一次，她告诉我她要拯救我的灵魂，把我交给耶稣。我猜我是深受震动了，也许还有点害怕——她真会改变我吗？——于是我告诉了父母，此后这些故事就停止了。

另一个女仆带我去克拉科夫的那些大教堂，特别是那个圣玛丽大教堂，那是一个位于城市中央的有哥特式尖顶的禁堡，里边有著名的中世纪雕塑——带角的、木质的、痛苦的耶稣的雕像躺在棺材里，边上围绕着圣母玛利亚及耶稣的使徒们，他们扭曲的躯体饱含深深的痛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就是那个女仆告诉我走过教堂时应划十字，此后我就有意识地那么做了，即使经过一座教堂时是坐在电车上。很多其他乘客也这样做——悄悄在胸前做一个小手势，全程重复好几遍，并伴随着一种快速而心照不宣的眼光。

在家里，我们每年都有一颗圣诞树，圣尼古拉斯节我们也都有礼物；我父母这样做不是以此作为文化同化的姿势，而是为了让我妹妹与我在周围的节庆活动中不会感到被隔离。我看不出这与逾越节晚餐——我们在家里举行的唯一的犹太教仪式——有任何不协调。他们都是特殊的场合，都是节日。即使母亲解除了我的基督教以后，圣诞树还继续留在我家。但停止其他仪式对我来说很容易。确认犹太人身份让我心里明朗了。所以，身为犹太人这已是确定的，这就是我。虽然直到现在，说起犹太人，母亲一直充满眼泪，而且用一种只能半懂的低声耳语述说，但当她终于直接说出来时，她表示这是值得自豪的——是值得一个人去全力维护的。“他们会告诉你，你比他们更糟糕，”她说，“但是你必须知道，你不比他们糟。你很聪明，有才华，你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反犹主义这个主题现在经常出现，但是当我父母——尤其是我母亲——说起这个话题时，声音中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耻辱。“我们已遭受了那么多，他们还恨我们，”母亲忿忿地说。“你能想像这么原始的东西吗？这是他们的母奶里喝来的。“原始”是比“不道德”或“恶”更负面的评语。原始的意思是“粗俗，不开化的，”没人想要这样。这种反犹主义是一种黑暗心态，一种偏见——而不是一种对道德准则的偏离。总的来说，这样的准则看来不会对波兰人的想像力有什么影响。波兰文化是亲法文化，我周边的人是基于智慧和风格互相评价的（说某人“愚蠢”是一个人能作出的最具权威性和频繁的评语），或基于他们有多优雅，或多妩媚，或多笨拙，或多没脑筋，而不是基于他们是否正直或缺德。